

漳州师范学院

ZHANGZHOU NORMAL COLLEGE

2003届本科毕业生

# 优秀毕业论文选编

漳州师范学院教务处

2003年7月

2.477

219

## 前 言

毕业论文（设计）教学，是大学本科教育阶段重要的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是评价学生综合能力的一个重要窗口，是学生四年来所学的基础理论、基本技能和创新能力的综合检验。为进一步反映和交流我院各专业本科生学习研究的初步成果，培养大学生创造性思维和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不断提高毕业论文（设计）的质量，我们在各系评选、推荐的基础上，从2003届（99级）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中遴选出14篇优秀毕业论文编辑成册。

由于时间仓促，本论文集在编印过程中如有疏漏之处，恳请批评指正。

漳州师范学院教务处

2003年7月

# 目 录

汉语同源词研究刍议	黄艳明 (1)
李煜梦词解读	卓聪敏 (12)
网络文学的生存状态及其文学价值	黄宣明 (19)
王莽新朝: 汉代儒家理想主义的顶峰	梁秋容 (27)
高校后勤社会化中的德育问题刍议	陈发奋 (35)
论加强高校德育工作之情感教育	许晓玲 (41)
机遇·挑战·对策	蒋 玲 (48)
从跨文化角度浅谈英汉成语互译	张志江 (53)
关于 Pell 方程和的公解	洪诗弹 (60)
一类 $R^2$ 上奇异非线性多调和方程的正整解	施秋杞 (65)
量子点的气相生长机理的研究	蔡丽珍 (78)
校园信息发布系统设计与开发	吴鹏腾 (85)
Rhodamine.6G-HFInBr <sub>2</sub> ·SiO <sub>2</sub> ·nH <sub>2</sub> O 双发光分子纳米微球的合成与 固体基质室温磷光光谱特性及其测定 DNA 的研究	梁雪水 (104)
H <sub>2</sub> O <sub>2</sub> /UV-CAF 复合絮凝剂对源水处理作用的研究	甘德根 (117)

## 汉语同源词研究刍议

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 黄艳明 指导教师 施榆生

**摘 要** 本文从语音、语义、文化心理三个角度评述汉语同源词的研究状况。本文认为：在语音方面，同源词的判定不应拘泥于现有已建立的语音模式，当以符合语音发展规律为总的原则；在语义方面，要将同源词的语义研究推进到深层义的层次上，积极运用词义的引申规律来探讨同源词的义通规律；同源词的研究离不开文化心理的观照。同源词的研究应结合上述三者共同考虑而不能将之割裂开来。

**关键词** 同源词 音近义通 深层义 文化心理

词源的探求与研究源远流长，早在东汉便有人开始有意识地探讨语源问题，如刘熙的声训专著《释名》；之后北宋王圣美提出的“右文”说，南宋王观国提出的“字母”说，以及张世南的“右旁多以类相从”说对语源研究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清代的学人对同源词的研究更是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段玉裁、王念孙、黄承吉、陈澧等就总结出一些形成同源词的规则和条件，其中“因声求义”这一重要的训诂方法日臻系统化、理论化，已初步涉及到了语言中的音与义的关系；清末以来，章太炎的《文始》、黄侃的研究探索、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汉语的词族》、沈兼士的论文《右文说在训诂学之上的沿革及其推阐》等把汉语同源词的研究又推进了一步。但是，综观历代学者的研究，我们不难看出，在缺乏正确的语言学理论和科学方法论指导的情况下，他们的研究及著述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如刘熙声训的主观任意性，王圣美“右文”说的以偏概全，章太炎《文始》中某些音义联系的牵强附会，等等）。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汉语同源词的研究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日愈深入，日趋成熟，“特别是 1982 面世的王力《同源字典》，可以说是我国两千年来语源研究成果的结晶和集大成之作，标志着语源学的发展与成熟。”<sup>[1]</sup>学者们对传统语源研究进行深刻反思，对语源学理论进行全面探讨，对语源研究方法深入探索，对同源词进行系统研究，<sup>[2]</sup>有的学者则引入了文化学的内容，在文化的视角中探求、阐释同源词。但是，尽管如此，关于什么是同源词，如何判定同源词，学者们众说纷纭，没有形成一致的观点。下面列举几种有代表性的看法：

1、王力：凡音义皆近，音近义同或者义近音同的字，叫做同源字。这些字都有同一来源。<sup>[3]</sup>

2、张世禄：所谓同源词，是指音近义通或音同义近，可以认为同一词源，即表示相关意义的音素所派生出来的词。<sup>[4]</sup>

3、陆宗达、王宁：由同一根词派生出来的词叫同源派生词，简称同源词。<sup>[5]</sup>

4、严廷德：同源词指的是词汇在发展过程中由同一语源孳生出来音义相关的一个个词族。它是语音和词义两种要素相适应的产物，意义上的相关和语音上的相同相近是构成同源词的必要条件。<sup>[6]</sup>

综观上述定义，同源词有共同的语源是大家所共同认可的，争执不下的是同源词的音义

问题。王力提出要“音义皆近”，张世禄提出要“音近义通或音同义近”。严廷德则放宽音义联系的要求，提出“音义相关”，陆宗达、王宁对音义的联系放得更宽，在上述的定义中，他们就没有把二者的联系列为同源词判定的必要条件。这几位专家争论的实质其实就是：是从宽还是从严来把握同源词音义关系的判定标准。

我们认为，判定同源词音义关系的标准宜从宽把握。我们同时也认为同源词的判定其实相当复杂，音义关系的标准无论是从严还是从宽，都无法、也不可能做到完全推源和全部系源。死死抓住音义关系的“相近”、“相通”、或“相类相关”恐怕只会让我们的眼光和思维受到限制，不仅不能窥得同源词的全貌，甚至连“同源词的定义及其本质是什么”的问题我们都不能确切地把握住，从而使我们的研究走入歧途。

那么，同源词的定义该如何下呢？为什么说即使我们从宽把握同源词的音义关系，也未必能窥得同源词的全貌呢？

我们说，同源词的音义关系宜从宽把握。“音近义通”从理论上讲，应当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因为，“同源派生词的音义，由于都是从根词早已结合在一起的音义直接或间接发展而来，因此带有历史的、可以追溯的必然性。”“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准确地掌握音近与义通的规律”，<sup>[7]</sup>“音义问题中最基本的又是音义的识别问题”。<sup>[8]</sup>而就当前同源词研究状况而言，由于定义的不一致，判定标准的宽严不统一，使得同源词的研究陷入了一种既不能将所有的不同源的字从我们的研究中剔除，又不能把所有同源的字系统地整理出来的尴尬境地。我们提倡音义关系判定的从宽把握，其实就是要让同源词的研究在更大的限度内接近语源研究的事实，尽量还同源词词族系统以原貌。但是要真正做到这一点，要使语源研究摆脱目前的尴尬境况，仅靠同源词音义关系判定的从宽原则，我们认为是不够的，“语源（主要是词源）在本质上是属于文化心理的，词源结构是一种认知结构。……因此，单凭音近义通来研究同源词，显然是一种形式化的研究方法，与语源问题的本质属性是有些隔膜的。找到问题的症结，就可以顺乎逻辑地引出一个新的课题：汉语语源研究除了使用传统的形式化方法之外，还应该有个文化的视角。”<sup>[9]</sup>

因此，我们认为，同源词的实际应是：具有同一语源，在共同内在的民族文化心理的支配下孳生繁衍出来的在音义方面具有一定联系的词族系统，它通常表现为语音、语义的相近相关。关于同源词的研究，我们面临着三大任务：一是确立“音近”的程度，二是总结“义通”的规律，三是从文化心理的角度观照语源研究。下面我们分别予以具体论述：

#### （一）同源词“音近”问题。

同源词之间音近到什么程度，这一点很不好把握。历来许多学者致力于建立一种语音标准模式，这些模式是否可行呢？

章太炎在其同源词专著《文始》中建立了一张《成均图》来说明同源字孳乳的语音关系。他利用这张图分析并提出了“对转”、“旁转”、“正声”以及“变声”的理论。对于章太炎所建立的语音模式，人们大多持怀疑态度，觉得语音无所不转，“声音并不相近，勉强认为同源”。<sup>[10]</sup>标准太过于宽泛了，并不能使人信服。王力先生在《同源字典》里建立了一套相对保守、但也较严密的语音模式。他认为同源字的判定标准应是“音义皆近，音近义同，或

义近音同”，“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读音相同或相近，而且必须以先秦古音为根据”，“必须韵部、声母都相同或相近”。<sup>[11]</sup>他具体阐释了“叠韵、对转、旁转、旁对转、通转、双声、准双声、旁纽、准旁纽、邻纽”的理论，凡符合王力这些规定的都可认为是声音相近的关系。王力先生抱着宁缺勿滥的原则，力求使读音标准科学化，严密化。但是，有人也对此提出了批评，齐冲天就认为，“《同源字典》坚持这一点，用来作为选择同源字的基本要求”，于是出现了以下两种情况：“（一）抛弃了大量的传统声训中所提供的语源关系。”“（二）与此同时，有些意义上或多或少的同义词，并没有更多理由说他们同源，只是语音上感到相近，也就收进了同源字。”<sup>[12]</sup>齐冲天并列举出论证详实的例证，他的批评是具有说服力的。他在《论语源研究》中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双声为训和叠韵为训相结合”。认为“汉语的实际是：双声为训的词之间，韵母差距也有远有近。”“大凡声韵分裂的词，双声为训与叠韵为训，多半均已具备，所缺的便是两者的结合。”<sup>[13]</sup>与王力先生建立的语音模式相比，齐冲天先生的模式就放宽了许多。但是这种相对较宽的语音模式，就能全面反映同源词之间声音孳乳的实际情况吗？我们也不以为然。

诚然，同源派生词的语音，由于都是从根词的语音直接或间接发展而来的，它具有历史的、可以追溯的必然性是值得肯定的；同源词之间声音的相近相关也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从语音历史发展的实际来看，同源词之间的音变轨迹有的可能很长，其间它们经历的音变是多次的，再加上语音环境的影响，历史的音变，方言的差异，使用的讹传等等原因，同源词之间的语音差异达到怎么样的程度，有些可能已远远超出目前那些保守的语音模式所设想的那样，纽或韵的距离远些是不足为奇的。再者，“汉语不是拼音文字，往往会掩盖音变现象”。<sup>[14]</sup>汉字的形体中不具备具有体现组成音的音素，这必然使语音的发展多了一些动荡的因素。基于上述的原因，我们认为，无论是从宽还是从严的语音模式，都只能局部地反映同源词之间的语音状况，它们“都不能做到既把所有不同源的字剔除出去，又把所有的同源的字都包括进来。”<sup>[15]</sup>这种建立语音模式的方法本身就不足取，同源字之间的语音发展变化是非常复杂的，仅凭一些语音模式是无法反映全部语源实际的，甚至出现错误，其缺陷就在于以偏概全、没有具体分析。我们来看几组例子：

(1) 报：复。王力《同源字典》认为：“在报复、报告的意义，‘报’与‘复’同源。”原因在于：从古音上看，它们是“帮并旁纽，幽觉对转，”可谓音近；从意义上，王力举了许多例句，证明同义。但是，我们从语源的角度分析，这两个字不可能同出一源。“报”的本义是断狱，《汉书·张汤传》：“讯鞠论报。”苏林注《苏建传》曰：“报，论也，断狱为报。”在这个意义的基础上，才引申出“报告”和“报复”的意义。从语源上分析，“报”、“复”是绝不可能同源的。王力先生的《同源字典》往往仅凭声近义同或声同义近或声义皆近来判定同源词，难免会出现错误。<sup>[16]</sup>

(2) 冒：墨。王力认为二者是同源词。从语音上，二者是“幽职旁对转”，同为明母，可认为语音相近；在意义上，朱骏声明确指出“墨假借为冒，犯而取之也”，王力先生以为“冒”与“墨”实同一词，二者同源。但是，我们认为“借字反映出的是另一个意义毫不相干的同音词而借义则是从他词中转移来的，如果以借义来系源，便会混淆同源与假借，把借

字系联到意义无关的词群中去。”因此“应从被系联的同源字中，排除借字与借义。”<sup>[17]</sup>“冒”与“墨”是否同源，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sup>[18]</sup>

(3) 𡵓、兑、隧、術、达、駝、戾。章氏认为同源。语音上，“兑从 𡵓 声，其声盖亦兼在喉舌，或作舒齿音。”“盖‘𡵓’对转为兑，次对转隧为‘障’，又为‘術’，邑中道也。兑又孳乳为达，行不遇也。行无辇语，故亦训通”。“‘兑’者戾也，谓户。”以章氏的语音标准，这组字可谓音近了，但是，“从意义方面来看，则大有问题，山间陷泥（‘𡵓，山间陷泥地’，《说文》）与湖泽大相径庭，与隧道更是风马牛不相及。至于孳乳为达，为駝为戾（户），更不知所据面云然。”<sup>[19]</sup>

从上面的例证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语音标准模式捉襟见肘的困境。例一这组同源词，音义都相关，但是却忽略了它们是否有同一来源；例二、例三的两组词语音相关相近，但意义是否有渊源关系又值得怀疑了。“我们认为，在现有的条件下，应该放弃建立并完善语音标准模式的企图，而采用具体论证语音关系的方法。这就是说，在判定某一组字是否同源的时候，应根据具体的材料去论证这组字是否可能来源于相同或相近的语音形式，以及从构拟的古音形式分化为这几个字的读音，是否符合语音演变规律。”<sup>[20]</sup>

综上所述，我们对待同源字之间的语音问题的态度是：不拘泥、不局限在任何已建立的语音标准模式，从宽对待同源字之间的语音关系，符合语音演变的规律是我们判定同源字语音关系的总原则，而语音的相近相关不过是语音演变中所体现出来个别规律罢了。我们应采用具体材料具体论证的方法去探求那些待证的同源词的语音关系是否符合语音的演变规律，但在具体求证过程中，利用语音关系的相近相关来按图索骥，顺藤摸瓜，以完成推源与系源工作，则不失为语源探求工作的一条捷径。

## （二）同源词的“义通”问题。

王力先生对于同源词的意义关系说得十分明确：“同源字必然是同义词，或意义相关的词。”他把同源字的意义关系分成三种情况：一、实同一词；二、同义词：①完全同义，②微别；三、各种关系（包括十五种关系）。<sup>[21]</sup>应当承认，王力先生对同源词具有的意义关系的概括是相当完备的，但是这种归类其实只是停留于词义的表面，没有进入到深层义的分析。孙雍长先生则对同源词之间的意义关系作了较深的挖掘。他将语词分为“物名”与“事名”两大类，结合词的“立意”之义与“所指”之义的不同存在，来考察同源词的意义关系。我们姑且不论其提法是否科学，但就其所论内容来看，已接近了词义的深层内容。<sup>[22]</sup>王宁先生对汉语词源意义的探求更见深刻、精辟。她分别讨论了单音节派生词和双音节合成词的造词理据。她总结并归纳出单音节派生词的意义关系：“同源词的类义素是各不相同的，而核义素是完全相同或相关的。”并为之概括出了公式：“ $Y[X]=N[X]/+/H/$ ”。（其中， $Y[X]$ 指的是一组同源词词族中的某一个同源词， $N$ 为类义素， $H/$ 即为造词理据，称为“核义素”或“源义素”。）她也分析了双音合成词的造词理据，指出：“它们的造词理据应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参与造词的词素（由古汉语单音词转化而来）各自意义的来源；二是它们结合凝固的原因。”<sup>[23]</sup>

同源词之间意义关系研究的日渐深入，必然要从表层义的归类进入到深层义的研究。所

谓词的表层义是指“有确定的指称对象（包括纯客观的指物义和凝结在其中的主体意识）、有独立使用价值的意义。”而“同源词的深层义是指来自于同一个源头的词语所共同具有的词义成份”。词的深层义依附于表层义，“它不与特定的具体对象相联系，只有一种宽泛的、粗略的意义指向，并依附于表层义上起作用。”它“体现着其中隐含着的某种词义义素，制约着表层义的具体指代范围，把具体指称对象不同但具有相同词义义素的词语串系在一起。”<sup>[24]</sup>同源词的深层义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造字所取的理据，也就是王宁所说的“核义素”或“源义素”。在一组同源词中，其表层义各有等差，而深层义却是完全相同或相关的。我们探究同源词的“义通”规律就是要抓住同源词的深层义来系联、推源同源词，所谓的“义通”也就说同源词之间是通过深层义连结在一起的，它们之所以相通就在于深层义的共同或相关。下面看两组同源词：

1、壬、丕、颈、胫、茎、迳、径、轻、胫、姪。壬，《说文》：“象物出地挺生也。”物出地而挺生，有“直”义。丕，《广韵》：“直波为丕。”经，《说文》：“织从丝也。”径，《尔雅》：“直波为径”。颈，《说文》：“头茎也。”胫，《广韵》：“脚胫。”茎，《广韵》：“草木干也。”径，《集韵》：“直也。”迳，《集韵》：“直也。”轻，《说文》：“牛膝下骨也。”段注：“牛胫也。”胫，《玉篇》：“直视也。”姪，《说文》：“长好也。”<sup>[25]</sup>上述诸字的深层义都是“直”义，它们的不同之处只在于所指对象的不同而已。相同或相关的同源词深层义是同源词聚合在一起的纽带。

2、盘桓、判涣、徬徨、屏营、徘徊。盘桓，陶渊明《归去来辞》：“抚孤松而盘桓。”《广雅·释训》：“盘桓，不进也。”判涣，《诗·大雅·卷阿》：“伴奂尔游矣，优游尔休矣。”《郑笺》：“伴涣，自驰纵之意。”徬徨，《国语·吴语》：“王亲独行徬徨于山林之中。”屏营，《楚辞·九思》：“遽遑兮驱林泽，步屏营兮行邱阿。”《疏证》：“屏营，征伧，荐惊惶失据之貌。”《玉篇》注：“屏营，犹彷徨也。”徘徊，《广雅·释训》：“徘徊，便旋也。”《汉书·高后纪》注：“徘徊，犹徬徨，不进之意也。”<sup>[26]</sup>这组复音同源词都有“回转往还”之义，是为同源词深层义，其余语义上略微有别。

从上述的叙述和例证中，我们得知：同源词“义通”的界说比较明了，不会像同源词的语音关系那么复杂。同源词的意义关系是建立在深层义相同或相关的基础上，我们只须求得同源词中具有相同或相关的深层义就可说明其“义通”了。但是，在具体的操作中，“由于事物的联系无处不在，人们又常把事物的联系当作语义的联系，因此，系联同源词往往存在着很大的随意性。”<sup>[27]</sup>如何在一组待定的同源词材料中，在已知它们的语音关系符合语音演变规律的情况下，准确地把握住同源词的深层义，便成了判定同源词“义通”的关键。我们目前要做的，就是“须在汉语词源理论的指导下，确立分析词义内部结构的可操作法则。”<sup>[28]</sup>

建立科学的“可操作法则”，陆宗达、王宁在《论传统字源学》中，提出了一套相当完备、行之有效的“工作程序”：（一）从系联的同源字中，排除借字与借义。这一工作的要旨是净化同源字，避免混淆同源词与借字、借义。（二）借助古文献语言材料的比较来证其义通。具体的方法，作者提了三个：语言环境的置换、参考古代声训、重视字的通用。这些方法为同源词的判定提供了很重要的佐证。但这些方法对同源词的探求就显得力不从心了。



(三) 用引申规律来研究同源词的“义通”规律。<sup>[29]</sup>我们认为这一程序才是最主要的。同源词的义通关系是词义运动的结果之一,同源字的义通规律与词义的引申规律是一致的,考察同源词的义通规律就必须将之置于词义引申规律之中,只有这样,同源词词族系统的建立才能臻于完善而不流于零乱、残缺。

陆宗达、王宁在《谈比较互证的训诂方法》一文中,就尝试着归纳一些古代书面汉语词义引申的规律。他们将词义的引申分为三种类型:(一)理性的引申。其中又分为因与果、时与空、动与静、施与受、反与正、虚与实等六种类型的引申。(二)状所的引申。其中又有三种情况:同状、同所、通感的引申。(三)礼俗的引申。我们尝试着将一些同源词置于引申规律中考察,我们发现:这种方法是相当可行的。如“解:懈”,就体现了因果的引申;“跨:胯”,体现了词义的动静引申;“斯(劈柴):斲(瓮破):嘶(音裂):澌(流冰):撕(扯裂)”,体现了状所的引申。“鹿:禄:麓”,则体现了词义的礼俗引申。<sup>[30]</sup>这说明词义的引申规律与同源词“义通”规律是毫不相悖的。我们完全可以运用词义的引申规律来研究义通,来探求同源词。下面我们来看“壬”族的同源词,借助词义引申规律我们可以系联出同源词词族,而且可以做得很好。

据《说文》《玉篇》《广韵》等书,“壬”字共有四义:(1)平直;(2)美善;(3)审验;(4)空虚。这四个义项在文字的孳乳和词语的衍变中便成了词源意义,成了各组同源词中的深层义。示图如下:(图示在下一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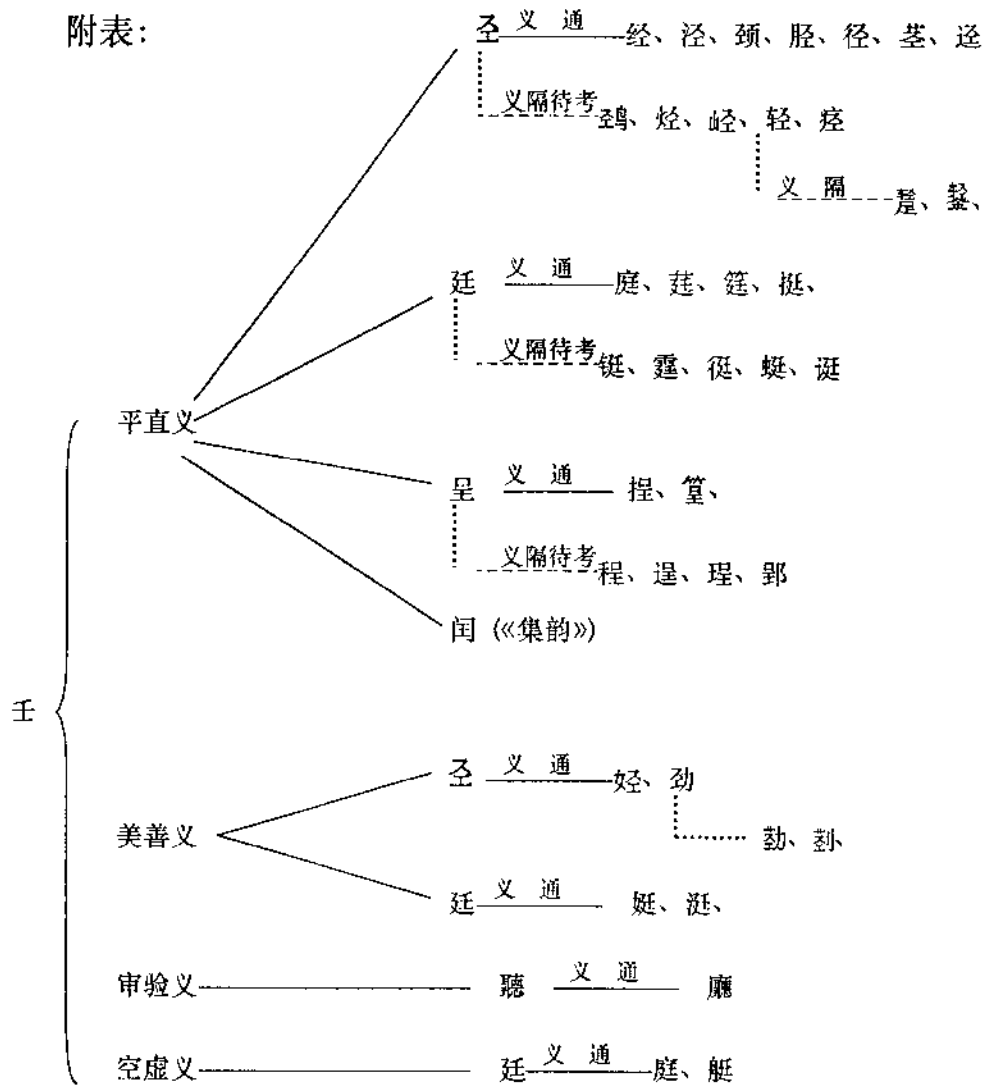
用词义的引申规律来研究义通,探究语源,是很可取的方法,但是,我们对于引申规律的研究,本身还很不成熟,还很不完善,加大研究力度,总结词义运动规律还有待于广大语源学家坚持不懈的努力。

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引申带有强烈的民族惯性,样式驳杂,规律纷繁,是很难掌握的”<sup>[31]</sup>我们无论对于引申规律的总结,还是研究同源词本身,都会很难免地牵涉到民族文化的问题,在它们的背后,是民族文化心理在操纵着它们的繁衍,孳生。下面我们就来谈谈文化心理在同源词研究中的作用。

### (三) 同源词的文化视角问题。

尽管从八十年代以后,语言学界的一些中青年学者积极投身于文化语言学这一领域,“他们开始突破纯语言学的框架,变描写为解释,开拓了把语言与文化结合的新路子”,<sup>[32]</sup>如今,文化语言学已初步建立,他们的研究也已颇具规模,日益深入。但是,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语源,这一课题目前还只能说是处于刚起步的阶段,我们目前能看到的也只有散见于各种期刊之中的零星的几篇论文,值得庆幸的是,它已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周光庆先生从若干的古汉语词源结构的分析中探寻中国古文化的心理状态,对词源结构中所体现的思维方式、价值系统、伦理观念有较深的揭示。<sup>[33]</sup>之后,陈建初提出了:“汉语语源研究除了传统的形式化方法之外,还应该有文化的视角。”他认为“语源在本质上是属于文化心理的,词源结构是一种认知结构”,他论证了汉语语源的文化视角,力图突破传统研究中纯形式化方法的局限。<sup>[34]</sup>王宁也提出阐释词源必须从文化历史的背景上加以证明和阐发,“因为,词的派生时期的文化历史,通过人的心理与思想,溶注到词的词源意义里,使词源意义与文化历

史产生了相互解释的可能性”。她认为词源意义中包含了古人的社会生活、传统观念，有些词的词源，还可以反映某一历史时期意识形态的变化，等等。<sup>[35]</sup>



(此表及其详细论证参见谈承熹《论汉语词源词》，山西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

关于文化的研究，有的学者从结构层次上将之分为外层、中层和内层三个层次：外层是物质状态，亦即物质文明；中层是心物结合的部份，比如我们所说的社会制度等；内层是人类的文化心理，包括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情趣、道德情操、宗教伦理等。<sup>[36]</sup>我们认为这种分法是合理的，特别是将文化心理作为一个内在层次独立出来，有助于文化学研究往深层次推进而不只是停滞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观照。从文化心理的层次来研究语源，也具有它独特的价值，因为同源词之间的孳乳、衍化乃至上文所提及的词义的引申，都无可避免地牵涉到古人内在的文化心理。这种文化心理是文字孳乳、词义衍化得以进行的内在机制。汉代刘熙说到：“名之于实，各有义类，百姓日称之而不知其所以之意。”自古“制

器立象”的“所以之意”，便是古人的文化心理作用下的不自觉的行为结果。我们研究古人的文化心理，就是要摸清这种心理机制如何运作的，从而指导我们的语源研究。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我们的研究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1)、从已有的词源材料中去分析、总结词源结构中的文化心理；(2)、结合文化历史背景，从古文化心理的角度去探求未知的词源结构和词源系统。下面我们分别讨论之。

#### 1、从已知的词源材料去分析、总结词源结构中的文化心理。

所谓的文化心理，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所生成的民族思维方式的认知心理。某一时期的文化历史，必然会在这种共同的文化心理的主导下溶注到由孳乳产生的词语中，使这些词语与文化历史之间产生了相互观照、相互解释的可能性。一组同源词里面，它们系联聚合在一起是通过同源词的深层义的纽带作用面形成的，但是在同源词的孳乳过程中，为什么同源词的深层义能常葆不变呢？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该民族有它们共同的文化心理，这种文化心理就潜藏在同源词深层义的背后，支配词义发展、同源词之间的孳乳。探求同源词，我们就可以挖掘到古人丰富多彩的文化心理。

从词源结构中我们可以看出古人的一个重要的文化心理：重意会。正是这种重意会的特点使汉民族的思维具有跳跃性、灵活性、模糊性的特征。知悉这种文化心理，我们对有些同源词之间的关系便不足为怪。比如说，古人称头顶为“颠”，但怎么会转而指向山顶的“巅”、木顶的“楨”呢？古文化心理的意会性，使同源字之间的孳乳便可以在某一共性的基础上由此及彼、由近及远地联系在一起，其反映在思维便免不了带有一定的跳跃性、灵活性和意义上的隐晦性。这样的例子很多，不胜枚举，如有了曲钩之“钩”，便孳生了木曲之“构”，軛下之曲者的“轳”，弯曲的竹制捕鱼器的“笱”，驼背的“侷”，卷曲干皮的“胸”；有了黑色目童子的“眡”，便有了黑橘的“杼”，黑犬的“狺”，黑土的“垆”，黑水的“泸”；等等。

从词源结构中反映古文化心理突出的另一点是：重具象。汉民族具有直观的思维方式，具体表现为很强的具象性。在汉民族这种具象思维的文化心理支配下，同源词之间的孳生常常会把事物间相同的形象作为词语分化的线索，从而聚合成一组组的同源词，比如，小栗称为“櫛”，小鱼称为“鲋”，小鸡称为“鷄”，小兔称为“鶖”，小鹿称为“麋”，这些同源词指称的类各不相同，但它们的形象特征都具有“小”这一共同特点。虾蟆谓之“科斗”，花苞谓之“骨朵”，小颗粒谓之“疙瘩”，这些同源词指称的也是不同类，但它们都具有“圆突”这一形象特征。人们在认识事物并为之命名时，常常会自觉或不自觉根据事物的形象特征（表现为性质、情状等）来予以分类、归纳，乃至把这些形象特征纳入自己造词的理据之中，繁衍出新字。

从词源结构中我们还可以看出重辨证的古文化心理。反义同源词是最好的例证，如受授、买卖、钝锐、椎锥、顶底等等，它们都是反义而同源。出现这类现象，其实就是汉民族重辨证的文化心理在起作用。原因说穿了，其实也很简单。“世界万物都是矛盾对立面的统一体，矛盾对立双方无不在一定条件下向其对立面转化，这一辩证规律在语言中也有反映”，<sup>[27]</sup>从而产生了反义同源词。

从词源结构中我们可以挖掘出丰富的文化心理，除上述三种之外，还有文化心理的类比

性、整体性等等，限于篇幅，本文不一一讨论。从上述的论证中，我们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从词源结构中研究、归纳古文化心理，这一方法大有可为，具有很高的价值，对于词源的研究，是很有帮助的。在这一方面，我们的研究还不够深入，还需要广大学者的投入！

2、结合古文化历史背景，从古文化心理的角度探求未知的词源系统与词源结构。词源结构在本质上是属于文化心理的，是一种认知结构，而这种认知结构反映的民族认知心理必然是在相应的文化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因而，我们不仅可以从词源结构中可以看出古人的文化心理，可以了解到古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系统、伦理观念等<sup>[38]</sup>，我们也完全可以结合古文化历史背景，从古文化心理的角度来探求未知的词源系统与词源结构。这一方法在理论上可以说得通，但在实际操作中难度很大，因为关于古文化心理的挖掘我们还处于表面探索阶段，关于古文化历史背景的复原我们也力有不逮，知之甚少，现阶段比较现实的作法是：运用音近义通这一形式化方法探究语源时，在对某些词很难确定是否同源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结合古文化历史背景，从文化心理的角度去探求之。我们相信，只要是同源词，无论是语音还是语义上，它必然会“表现出更深层次的文化心理和背景上的某种联系。”<sup>[39]</sup>

宋永培博士在这一方面就做得比较好，他的论文《〈说文〉意义体系记载了“尧遭洪水”的历史事件》就是这一方法成功运用的例证。据宋永培博士的研究，他认为《说文》的词义系统中，有对“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的历史事件的表述。由于有“汤荡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的恶劣水患环境，先民对于洪水畏之如虎，而对于可以提供安全的栖身之所的高山高地则表现出莫大的欢迎。于是，一些词表示洪水意，与之音、形、义相关的词就带有惊恐、哀痛义；相应的，一些词表示高山义、高地义，相关的一些词就有了欣喜义。如：洪（洺水也）：拱（战栗也）；崇（山大而高）：晬（乐也）；浥（湿也）：悒（不安也）；熙（燥也）：嬰（说乐也）等等。<sup>[40]</sup>值得一提的是，上述的这几组词，除了语音相同相近，字形有一定联系外，语义相差很远，用传统的“音近义通”的形式化方法，我们很难说明它们有同源关系。可是参照古文化历史背景，从文化心理的角度来分析，我们认为，这几组词的同源关系是可信的，因为它是“建立在对古文化史实的坚实考证和全面了解的基础上，建立在对民族认知心理特点的准确把握的前提下，而不是随心所欲的主观臆断”。<sup>[41]</sup>

当然，这一方法还很不成熟，一些观点的提出目前还处于假设阶段，它们是科学理论还是主观臆断，还需要我们花大力气去考据求证。要建立起这样的一套系统而完备的科学研究方法，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它不可能一蹴而就，摆在我们面前的，将是一段漫长的探索之路！

本文从语音、语义、文化心理三个角度来观照汉语同源词的研究，希冀通过三者的分析能较全面地接近语源研究的事实，反映同源词的真正面貌。我们认为“音近义通”是可行性很强的方法，但是这一方法随着研究的深入，它的缺陷日益凸显出来，我们应当结合今人的研究成果，为之注入新的血液，予以更科学的阐释：在语音方面，我们主张放弃建立并完善语音标准模式的企图，采用具体材料具体论证的科学方法，从宽对待同源词之间的语音关系，符合语音演变的规律是我们判定同源词之间语音关系的总原则；在语义方面，我们认为，同

源词的语义研究要推进到深层义的层次上,同源词的深层义是研究同源词“义通”规律的关键,也是同源词系联聚合在一起的纽带,我们当前应积极运用词义的引申规律的方法来探讨同源词的义通规律,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音近义通”只是同源词常见的外化标记,它不能代表同源词的全部,“音近义通”的研究方法也只是纯形式的方法,词源学的研究往往局囿于此,它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不但不能全面实现历史推源和平面系源的任务,反将许多宝贵的传统词源材料搁置一旁,弃而不顾。因此,我们认为词源的研究还应引入文化的视角,从文化的内层即人类文化心理层次的角度来观照词源研究。“音近义通”是同源词的外化标记,而民族的文化心理则是同源词孳乳繁衍的内在机制,如果词源研究舍弃了文化的视角,它必然是不完整的,我们应将文化的视角纳入词源研究的范畴之中。语源的研究不应仅局限于纯形式化的方法,也不应只限制在纯语言本体的领域之内,适当地引入文化学的科研成果,从宏观语言学的意义上观照词源研究,我们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我们目前迫切要做的事是;尽快建立起一套关于运用民族文化心理来探求词源的科学可行的操作方法,使这一领域的研究得以全面展开。

另外,我们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并不片面地反对和抛弃形式化的方法,也不会抹煞传统语源学研究的突出贡献,我们主张的是“不要局囿于形式化方法,而是在使用形式化方法的同时,注重开掘文化的视角,二者紧密结合,互相补充,以弥补现阶段汉语语源研究方法上的严重缺陷。”<sup>[42]</sup>

我们有理由相信,将传统形式化方法与文化视角紧密结合,能使语源的研究更科学、更全面,能让我们窥见汉语语源世界里更深层、更丰富的内容。

#### 参考文献:

- [1][2] 《近十年来汉语语源研究述评》 陈建初 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0年第4期
- [3][10][11][19][21] 《同源字论》 王力 载《同源字典》商务印书馆1982年
- [4] 《汉语同源词的孳乳》 张世禄 载《扬州师院学报》1980年第3期
- [5][7][14][17][29][31] 《浅论传统字源学》 陆宗达、王宁 载《中国语文》1984年第5期
- [6][26] 《同源词管窥》 严廷德 载《四川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
- [8][12][13][18] 《论语源研究》 齐冲天 载《郑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5期
- [9][34][39][41][42] 《汉语语源研究的文化视角》 陈建初 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报》1992年第4期
- [16][20] 《同源字判定的语音标准》 钟敬华 载《复旦学报》1989年第1期
- [22] 《同源词之间的意义关系》 孙雍长 载《南昌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 [23][28][35] 《汉语词源的探求与阐释》 王宁 载《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
- [24][27] 《汉语词义学》 苏新春 广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7月 摘自P32、P71、P74、P77
- [25] 《论汉语同源词》 谈承焘 载《山西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
- [30] 《谈比较互证的训诂方法》 陆宗达、王宁 载《训诂与训诂学》 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7月
- [32] 《论语言与文化》 沈锡伦 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

- [33][38] 《古汉语词源结构中的文化心理》周光庆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  
[36] 《要研究文化的三个层次》庞阅 载《光明日报》1986年1月17日  
[37] 《论反义词同源和一词兼有相反二义》伍铁平 载《外语教学与研究》1986年第2期  
[40] 《〈说文〉意义体系记载了“尧遭洪水”的历史事件》宋永培 载《古汉语研究》1991年第4期

**导师评语：**黄艳明同学大胆选择“汉语同源词研究”这一难度较大的课题，经过认真研读词源学重要论著并进行反复思考，形成从同源词的语音、语义和文化心理三个角度评述汉语同源词研究情况的思路。作者在全面、客观的评述相关学术成果的同学，对同源词的定义、当前词源研究存在问题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文章结构完整，论证丰富，论述清楚，语言平时规范，引文注释评实。故此推荐为优秀毕业论文。

## ON THE STUDY OF THE HOMOLOGY WORD OF IDIOM

Huang Yan-ming    Instructor: Shi Yu-sheng

**Abstract:** This text probes into the state studied in language source in terms of pronunciation, semanteme and culture psychology. At pronunciation, homology word judge should regard to the law of pronunciation development as the total principle; At semanteme, language research of source should get deeply to deep level of the meaning of a word ,and should use the amplification law of the meaning of a word to study the “ coherent meaning” law of the homology word actively; besides that, language source study should introduce visual angle of culture .culture psychology and language source study two take each other into consideration Homology research of word should closely combine but not isolate three items of these.

**Key words:** Homology word; similar pronunciation and coherent meaning; deep meaning; culture psychology.

## 李煜梦词解读

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 卓聪敏 指导教师 王春庭

**摘 要** 梦的意象在李煜词的意象群中占了主体地位。身为帝王却生在词林之中的李后主，由于有着独特的身世、遭遇与生平变故，形成了独特的气质和情感。由于梦有着其独特的心理特征，李煜选择了梦的意象来抒发自己的情感。梦的意象的成功创造，使李煜词的艺术成就更为突出。

**关键词** 李煜 梦 意象

自从庄子写了著名的“庄生化蝶梦”（见《齐物论》）之后，两千多年来，写梦的诗文屡见不鲜，或叙述非凡的故事，或创造奇特的意境，或以比兴寄情。以梦入词也不自李煜始。李白的《忆秦娥》这首千古绝唱第二韵就写到：“秦娥梦断秦楼月”。此后，写梦的词文又何其多也。而在众多词人中，李煜的写梦词却格外引人注目。

李煜存世词仅三十多首，而写到梦这个意象的词就有十几首，这可谓是其词的意象群中最独特的一道风景线。写梦似乎成了李煜的癖好。有时，他在同一首词里一再写梦，如《子夜歌 人生愁恨何能免》《谢新恩 秦楼不见吹箫女》；有时，几首同调词接连写梦，成为写梦的“组词”，如三首《望江南》；甚至在他的“绝笔”<sup>[1]</sup>（P44）之作《浪淘沙令 帘外雨潺潺》中也仍在写梦。李煜入词之梦多种多样，有“春梦”、“闲梦”、“醉梦”、“迷梦”、“归梦”，还有无梦之梦，不一而足。可以说写梦贯穿了李煜创作的始终。这个不寻常的现象值得研究，这对我们理解李煜的词旨，揭示其艺术特征，更好地欣赏他的词作都不无意义。

总体看来，李煜的梦大体可以分为三类：沉溺于人欲中的春梦，即写男女的爱，离情别绪；怀恋故国的残梦，即写怀乡念人，抚今追昔；趋向空寂的空无之梦，即写人生无常，命运难测。这三种梦境的历时变化，构成了李煜的心路历程，亦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一种较典型的精神样式。

首先，这位“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sup>[2]</sup>（P4）的风流皇帝，亡国前耽于声色，过着荒淫奢靡的生活。在《却登高文》中他自供道：“昔时之壮也，情繁乐恣，观赏忘劳……量珠聘伎，纫粉维艘。被墙宇以耗帛，论山丘而委槽”。李煜此时的词作，大都是这种生活的写照。有的写通宵达旦的宫廷歌舞宴饮，如《浣溪沙》：

红日已高三丈透，金炉次第添香兽，红锦地衣随步皱。  
佳人舞点金钗溜，酒恶时拈花蕊嗅，别殿遥闻箫鼓奏。

彻夜的宴饮歌舞，放纵的感官享乐，日高三丈了仍然没有停歇的意思。不必说当时腐败之深了，就只读了这首词，也会令人愤懑地发一声“西湖歌舞何时休”般的慨叹吧？有的描绘他与宫女、小周后的恋情；再者就是咏美人之口，写宫人肌雪飘香、情人幽会、女子怀人。概言之，就是宫廷醉生梦死的生活与恋情。李煜这个时期的写梦词所表现的也正是这些内容，几乎不曾涉及江山社稷、天下苍生。“潜来珠琐动，惊觉银屏梦”（《菩萨蛮 蓬莱院闭天台女》）

写白日与情人幽会；“宴罢又成空，魂迷春梦中”（《菩萨蛮 铜簧韵脆锵寒竹》）写宴后伊人离去，思念之情寄于春梦。“可奈情怀，欲睡朦朧入梦来”（《采桑子》），“梦回芳草思依依”（《喜迁莺》）也是写恋情的。前者写无可奈何，相思成梦；后者写春梦初醒，意迷神驰之状。

这些词中出现的梦的意象，与李煜追寻感官刺激，尽情享乐的生存态度直接相关，乃是他颓靡精神的一种表征。同时，这些词中梦的意象总是与“醉”、“懒”、“迷”等表现生命疲软的词语联用也绝非偶然。因为无论是《菩萨蛮》中写幽会小周后时“魂迷春梦中”的梦感，还是《谢新恩》中写与恋人相会“如梦懒思量”的梦感；无论是执着现世声色感受，还是无奈地面对现实，这种人生态度堪称为“醉生梦死”，本质上是顺应生活，以现实为梦。

一般而言，梦的时空乃是心理的构成，是与现实时空相对的。根据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梦是属于生命本质力量或无意识内容的象征与转换，是对受到压抑的心理能量的释放。因此，梦总是与现实的理智人生互相补充、互相对立。如庄子的“蝴蝶梦”即是体现着生与死、我与非我、实在与虚无等诸多人本问题的象征。明代散文家张岱在《西湖梦寻·自序》中曾说：“余生不辰，阔别西湖二十八载。然西湖无日不在吾梦中。……则余梦中所有者，反为西湖所无。”<sup>[3]</sup>（P489）他正是为失去的现实的西湖，构筑了精神的梦的西湖，以时空的矛盾对峙，表现出深刻的生命体验。但是，在李煜的这类词中，没有真正的梦，只是被“迷”、“醉”感所梦化的现实。这个梦化的现实中，即没有生命应承受的困扰，也没有精神的波动，只如一潭没有涟漪的死水，也难怪暘谷在《转烛飘蓬一梦中》一文中会用“魂迷春梦中”来评价李煜这个时期的词作。

其次，人生永远伴随着愁恨，这是任谁都无法避免的；而对那些特别多情、特别敏感的人来说，则愁恨似乎有意和他们作对，更会袭击得他们黯然销魂。就李煜而言，从二十五岁作皇帝，到四十岁降宋，四十二岁生日时被药毒死，其间命运产生过巨大的变化。首先，当北宋王朝的势力开始对他构成压迫时，他梦化的现实被打破了，不得不承受生存困扰。接着，他弟弟从善入宋被扣为人质，让他尝到骨肉分离的惨痛滋味。这时他写下了《清平乐》一词：

别来春半，触目柔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

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

再不是“纱窗醉梦中”，再不是“如梦懒思量”，思亲之痛如潮水般无时不冲激着他，落梅如雪，春草无边，平平常常眼前景却都成了他痛苦的表征。我们不得不佩服作为词人的李煜的艺术才能，并不着力的数笔便写活了那难以言说的苦痛之态。或者正是灾难和痛苦成就了他的艺术，有了生存的忧患，有了对现实的不满，才能正视现实，才真正有渴望有幻想有梦。他盼望与亲人重聚，于是有了“归梦”。但是“路遥归梦难成”，梦与现实残酷地对立着，逼出了他生命的活力，使他摆脱了声色与闲情的缠绕，真正进入生存体验，获得了艺术所要求的人类情感的普遍性表现。这难成的“归梦”便成了李煜步入艺术堂奥的门槛，但现实处境的越来越残酷，使他失去的不只是亲人，而是他曾有过的一切，乃至他自己了。一首《破阵子》写尽了国破家亡，沦为臣虏的悲怆：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

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销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他以回望的方式瞩目曾拥有过的家国山河，以及喧赫的生活，然而一切都远去了，成为



再不可及的过去。这让他感到杜鹃泣血般的悲哀，有着归不得也的绝望，于是只好把归心寄托于梦中了。在梦中拾捡过去生活的一二碎片聊以自慰，这梦便是一种残梦了。如三首《望江南》，词中极真切的描写了“故国梦重归”的情景，但毕竟已经不是过去可以在现实中找到的人了。在心理的时空中，过去迷梦的现实已化为虚无，真正是幻想之物了。这对曾经实实在在沉醉于声色中的李煜来说，毕竟是不愿接受的。因此，这样的残梦较之迷梦在情感结构上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以往现实与梦一重化的情感世界，转化为现实与梦对立的二元情感世界。一面是旧梦重温时那梦醒即失的快乐带来的短暂的慰藉；一面是梦醒回到现实时承受的巨大痛创。

李煜的残梦构成中，固然他帝王和臣虏的命运是个偶然，他所追怀的豪奢的宫廷生活没有积极意义，但他在生命过程中失去他所宝贵的东西，而且不再复还，却体现着人类情感的普遍模式。这和孔子临流叹息生命如逝水一样，超越了具体生存样式的情感状态。李煜的词最能唤起读者共鸣的正是从残梦中透出的那深婉的哀愁。诸如《乌夜啼》，从春花凋谢，感慨时光无情，可见他一颗诗心的敏感，因此道破了生命易逝的悲剧，便超出他个人遭际，成为人类生命共感之声了。

再次，根据柏格森的看法，否定作为一种精神运动有着一种积极的意义，这种精神运动就是拒绝一种存在以便去考虑另一种存在<sup>[4]</sup> (P59)。人承受痛苦是有限度的，在心理上潜在着自我消解的力量。李煜对以往豪奢生活的追怀，只能不断给他的亡国之痛雪上加霜，当痛苦使他精神疲劳时，便会产生对过去生存方式的否定之思。而对现世生存最有力的否定，乃是从生存本质上所作的否定。这一过程在下面这首词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昨夜风兼雨，帘帏飒飒秋声。烛残漏滴频倚枕，起坐不能平。  
世事漫随流水，算来一梦浮生。醉乡路稳宜频到，此外不堪行。

（《乌夜啼》）

这首词的上阕，通过秋夜风雨，渲染出一种生存危机的情境，这无疑会逼出人的痛苦感，以至“起坐不能平”，内心充满了矛盾和冲突。这时否定便隐含在其中了。下阕，心潮已平，把世事看透了，视生存为“一梦浮生”，生存价值即被从根本上否定了。这意味着新的生存态度代替了他曾执着的迷梦和残梦。他愿意躲到“醉乡”，别的什么都不管了。如果说他的迷梦之醉是醉于声色享乐的物质生活，现在的醉则是在空无之境。这正是“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子夜歌》）的乌有之乡。这无疑意味着经过对生存本质的质疑和否定，李煜已经走出了残梦的笼罩，走入了“空无之梦”的境界。当然，李煜这样的人并不能真正彻底否定他曾执着的梦，这首词中也仍带着些许的失落与惆怅。但是，他由迷梦到残梦，终归空无之梦的精神趋向是很清楚的。

## 二

那么，为什么李煜有那么多词都写到“梦”这个意象呢？他为什么对梦的意象情有独钟呢？这一连串的疑问让我们不得不问他的身世。

李煜，字重光，初名从嘉，号钟隐，是李璟第六子。他天资聪颖，好读书，“精究六经，旁综百氏”，且“洞晓音律，精别雅郑”，工书善画，尤精鉴赏。据传他有文集 30 卷行世，还有《乐说》百篇，在当时很被推崇，但都没有流传下来。今仅存诗 10 首，断句若干，文